本书是剑桥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，据总编辑序所写，由于先秦中国的历史资料因为考古工作的发展而逐渐丰富，本丛书的写作计划于1966年开始时，尚没有对这些新成果的普遍认可的综合，因此第一卷将从秦汉开始。由费正清、崔瑞德担任全书总编的剑桥中国史，在世界上享有非凡的声誉，被广泛地认为是出版时（第一本出版于1978年）西方汉学界的研究结晶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至少该丛书的部分内容有值得修改的地方，而在两位总编都去世的现在（2022年），剑桥中国史的第四本——隋唐史下卷——仍未出版。不过我有理由相信，本套丛书的出版跨度不会长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（1954-2015）。

与我曾读过的几本剑桥插图史的写作组织方式一样，本书的写作由数位不同的作者执笔，不过更特殊的是，第一卷秦汉史中还对一些已经出版的著作直接截取部分，作为本书的一章，如第十章“前汉的社会经济史”即截取自西嶋定生的《中国古代的社会和经济》。关于这种写作组织方式的弊处我已在《剑桥插图伊斯兰史》的评论中有所提及，好处也自不必言，能够尽可能地将学界最前沿地学术成果集合在一起，发挥每个学者在各自细分领域的优势。

对于中国的通史/断代史来说，我目前尚未有比较新的想法，主要还是以多读、涨认识、开眼界为主，愈是了解得多，愈是知道自己有不了解、不明白的地方，还不足以发表个人的己见。中国大陆主编的历史教材（这里主要以朱绍侯主编的《中国古代史》为参照）采取的是近乎狂妄自大的教条主义马克思理论，毫不犹疑地为古代历史下达最终的判决，在历史资料模棱两可之时，便能断言“阶级矛盾”、“代表了地主阶级”、“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”云云，读者读后往往只能得到异一肚子的教条。剑桥中国史的作者思想当然开阔得多，但有时，作者的怀疑的精神也可能有些泛滥，仿佛正史中一切价值判断都可能是偏见使然。

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可能是由于学术语境的缘故，既可能观察到不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注意之事（他们可能是将其当作寻常而忽略），也可能提出一些中国学者不会提出甚至不太会认可的理论。如本书中描述汉代官员中的两种思想政治派别，本书划分为“时新派”（modernist）和“改造派”（reformist），这一说法我似乎从未在中国学者的书中看到过。

或许比较起在中国大陆建国后所编写的大部头通史著作，本书要胜过任何一种，但我们总是希望，这样的杰出工作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。自己的历史都不能正确地认识，社会科学的工作还能谈何其他？